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演进

李德元 董建辉

提 要 | 自 20 世纪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已呈现出日趋新颖且丰富的学术场景,并成为人们批判性地审视国际政治变革的分析工具。本文通过对 20 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演进的梳理,突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理论架构及其发展流变,以期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关键词 | 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 西方国家

中图分类号 | D81

学
科
流
派

作者信息 | 李德元,男,1967 年生,博士,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361005。

董建辉,男,1966 年生,博士,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361005。

国际关系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中成长起来的一门学科,^①其主旨是建构一套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以探讨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之间的战争、和平与发展问题。自 20 世纪以来,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呈现出日趋新颖且丰富的学术场景,并成为人们批判性地审视国际政治变革的分析工具。随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演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理论、方法、争论焦点、发展趋势等日趋明晰。笔者大致把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演进分为 4 个阶段,^②通过对诸种大中型理论演进脉络的梳理,展现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谱系、理论架构及其发展流变,以期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一、1919~1945 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轫与自由主义流派的兴起

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创立以 1919 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为标

志,反映了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对结束战争的希冀。此后,来自法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循着各自的学科思路对国际关系理论展开了学术探讨,逐渐形成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几个主要理论流派。这些理论流派大都局限于各自的学科视野,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架构;所侧重的多是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个案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但是,它们毕竟开创了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的滥觞。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方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自由主义占据着相对的主导

^① 学界普遍认为,早在现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前,一些思想家就已开始思索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促成了国际关系的学科认同。

^② 关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演进的几个阶段,本文主要结合国际重大历史事件和国际关系学的标志性论著来进行划分。国内学者也有其他不同的划分方式,详见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的沿革》,载《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 年;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年。

地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肇基于 17 ~ 18 世纪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研究的出发点,并将国际社会的国家与国内社会的个人进行类比,或将国内原则延伸到世界政治中。它坚持人性本善的哲学观点,相信人们能够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民主国家间的合作等来避免战争与侵略等国际现象,进而保护个体的自由、正义与和平,从而使国际关系的进步与改善成为可能。为此,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个体的自由在构建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自由的保障有助于和平的实现,因为尊重个体自由的政府会由于受到约束而在外交政策中具有和平的意图。作为分析国际关系的一种方法,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试图理解集体决定,从伦理角度促进人权,试图改善人类环境”,^①体现了对个体自由、社会进步及利益和谐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乐观追求。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又发展出理想主义和功能主义这两种主要的研究倾向。理想主义相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对如何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充满憧憬。它主张从政府、国际组织、国际舆论、道德、国际法等层面唤醒人们的民主意识,通过启蒙和教育等克服人们的无知与偏见,以促进世界和平秩序的构建。1918 年,美国总统威尔逊(W. Wilson)提出了“十四点”原则,集中反映了他的理想主义思想。^②威尔逊强调建立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倡导多边国际机制与集体安全机制,确信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确保国际和平,并对强权政治和大国外交提出了批评。欧洲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国联^③的积极谋划者齐默恩(A. Zimmern)在《中立与集体安全》(1936 年)、《国联与法律的规则》(1936 年)等著作中,强调民主和公众教育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地位,主张用教育和知识来完善人性,唤醒人们的民主良知,以确保国际和平的实现。他还强调国联在构建国际法架构中的作用,以及英联邦在确立文明的国际准则方面的重要性。理想主义在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们有助于确立质疑既定制度(国家主权、均势、旧式外交、武器的私人制造)的可能性;并且,即使现在它们给出的答案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它们至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与和平、国际秩序等客体的关系中,这些制度起到了怎样的作用?”^④但是,当时的国际形势表明,纯粹依赖国际法不可能构建出一个和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国际格局依然是由大国所主导和控制的。所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理性主义可以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却不能使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⑤

功能主义则侧重从国际经济和社会合作等层面阐释自由主义理论,认为解决政治冲突和消弭战争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强调从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不断加强相互间的合作来实现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目的。米特兰尼(D. Mitrany)是功能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在《国际政府的进展》(1933 年)、《有效的和平体制》(1943 年)等著作中提出,世界正处在一个政治变革、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的时期,国与国之间应该在交通、科技等领域建立功能性合作,这种合作既可以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12 页。

② Woodrow Wilson, The Fourteen Points, in Phil William, Donald Goldstein and Jay Shafritz (eds.), *Classical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pp. 23 ~ 26.

③ 国联(League of Nations)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目及平息国际纠纷,但却不能有效地阻止法西斯的侵略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联被联合国所取代。

④ (英)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02 页。

⑤ (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 ~ 1939》,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第 28 页。

避免所建立的国际性机构过于松散,又可以在共同生活的某些领域建立广泛且稳定的权威。基于此,他主张打破传统的领土主权观,而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性功能机构。这个机构初期由少数国家组成,尔后其他国家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这种合作会自动进行扩张,最终形成一个功能性的网络,进而促进地区乃至国际一体化的形成。功能主义理论对莫内(J. Monnet)、舒曼(R. Schuman)等欧共体创始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战后成为新功能主义和地区一体化理论发展的渊藪。

这一时期,一些奉行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学者也将国际关系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阈,但他们的探究对整个国际关系学的影响微乎其微。挪威国际关系研究专家克努成(T. L. Knutsen)评价说,“在两次战争之间至少同时存在4种世界政治观点:理想主义、权力政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后三者从未得到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学科的承认,即使偶然提及,也总是被认为如果不是破坏性的至少也是无益的”。^①

二、1945~1979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嬗变与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的确立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东西方冷战开始,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英国学派也在一些欧洲国家逐渐形成。其中,自由主义演进为以哈斯(E. B. Haas)等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等理论流派。哈斯继承了米特兰尼等人的旧功能主义思想,强调功能领域合作对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但是他们更看重国家权力的作用,认为各民族国家内各种政治力量因追求各自的利益而施加压力所产生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一体化发展的动力。与旧功能主义相比,新功能主义“更加政治化、国家化和制度化,即更加强调一体化的政治过程方面,注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政治因素”。^②代表第三世界的国际关系学者则关注民族与殖民地解放战

争,秉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传统,而在20世纪60~70年代提出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形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是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阿根廷的普雷维什(R. Prebisch)、英国的弗兰克(A. G. Frank)、巴西的多斯-桑多斯(T. Dos-Santos)和埃及的阿明(S. Amin)等。他们认为,世界被分为中心国家(发达国家)和外围国家(发展中国家),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后者依附于前者。由于中心与外围之间国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但在如何解决这种不平等的依附这个问题上,各位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弗兰克主张调整和改善国际经济秩序;普雷维什主张致力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而阿明则主张彻底消灭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和霍普金斯(T. Hopkins)。他们运用中心—外围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从而解释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史。此外,欧洲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则继承格劳秀斯(H. Grotius)、洛克(J. Locke)等人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传统,形成了英国学派。英国学派强调国际社会是由共同的目的或利益、法律与外交等共同规则,以及共同的命运结合而构成的。他们以国家体系、国际社会等为研究主题,认同实证主义、诠释学和批判性的方法论上的多元化,以帮助理解国家体系、国际社会的独特性,从而为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许多具有批判性与规范性的研究议题。^③

①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② 白云真、李开盛,2009年,第74~75页。

③ 参见白云真、李开盛,2009年,第23页。

简而言之,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及一体化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关注平等、公正及国际不平等的根源,而英国学派则注重对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多层面探究。但总的来看,主导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的还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范式。与上述诸种理论不同,现实主义持人性本恶的悲观主义哲学理念,强调国家的本质就是追逐利益和权力,并由此得出国家间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结论。尽管他们并不完全否定道德、法律与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他们认为,因为武力威胁和军事力量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所以维持国家间军备力量的均势是调节冲突与维系和平的关键机制。

尼布尔(R. Niebuhr)、卡尔(E. H. Carr)、摩根索(H. Morgenthau)等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但奠基人却是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N. Machiavelli)、17世纪的霍布斯(T. Hobbes)和18世纪的卢梭(J. Rousseau)等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认为,国家的行为源于对利益的追求,而国家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决定了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在国际关系中,基于自然法的国际道德与法律义务是不存在的,道德的考虑必须让位于国家的利益。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受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影响,尼布尔、卡尔和摩根索等人就对当时盛行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从而奠定了现实主义的思想基础。1932年,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非道德的社会》中指出,个人行为可以是道德的和利他的,但国家的行为动机却是自私的。1939年,卡尔在《二十年危机(1919~1939)》一书中,将矛头直指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从而掀起了国际关系学史上的第一次论战,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1948年,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阐释了现实主义的系统思想、基本原则和研究范式,成为现实主义理论流派确

立的标志。他提出,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是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①国际关系学科“必须寻求归纳,而不是仍旧关注独特事件;本质上而言,国家间关系展示了行为和重复性的模型;学科的核心是探索国家行为的根源以及关系类型”。^②摩根索本人也因为对现实主义的贡献而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

在此期间,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第二次论战,即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为核心的传统主义与倡导行为科学方法的行为主义之争。争论的焦点集中体现在:行为主义将价值标准排除在研究之外,轻视国际关系的道义、伦理问题,强调用数学分析和统计分析等实证方法从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而传统主义否认价值中立的可能性,重视国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等因素,主张对国际关系进行传统的历史和哲学研究。此次论战的核心是方法论的问题,其结果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取得了优势,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式得到了整合,与之关联的材料积累与数据分析也得到了重视。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取得了话语霸权,却导致了其他研究范式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③现实主义理论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了震撼全球的世界石油危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能源短缺、人口爆炸等一系列全球性重大问题困扰着整个国际社会。战后一直在西方国际关系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充分诠释和阐明国际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支配着当时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是行为主义

①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 pp. 37~40.

②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 J.: Prentice hall, Inc., 1983, p. 9.

③ 参见秦亚青 2005 年,第 219 页。

理论,而现实主义与行为主义明显不相协调。在此背景下,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尝试对现实主义进行修正、改造和补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现实主义理论流派,而此前的现实主义则被称为古典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最先是由美国的批判理论家考克斯(R. W. Cox)提出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则是美国的华尔兹(K. N. Waltz)、吉尔平(R. Gilpin)、鲍德温(D. Baldwin)等人。华尔兹于1979年发表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范式汇聚的一个顶峰。^①华尔兹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诠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的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结构选择”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实践证伪性,比较容易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等步骤,得出分析结果。^②华尔兹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标准的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③克努成评价指出,“华尔兹的著作在方法论上是复杂的,在理论上是丰富的。它对社会科学经典著作、当代系统论、理性角色模式,以及对于结构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偏好,引发了直接的争论。这一紧随其出版之后的争论超越了对于国家和权力的狭隘强调。它直面理论建设的性质、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适当程序设计,以及其他抽象、与科学哲学有关的问题”。^④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对其他新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1979~1991年:现实主义理论的式微与自由主义理论的重构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现实主义因为恪守国家中心主义以及对跨国、国内的社会进程研究的缺失而备受争议。以跨国主义、相互依赖论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义,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向

现实主义发起了挑战,掀起了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论战。现实主义和跨国主义的争论成为第三次论战的焦点,新马克思主义则在第三次论战中处于边缘地带。跨国主义者认为,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嬗变,国家边界正在日益弱化,现实主义关注的纯粹政府间交往的研究不利于国际关系的阐释,因而应该关注跨越国界的所有交往行为与活动方式。^⑤经过争论,到20世纪70年代末,现实主义者不再恪守国家中心主义,转而注重借由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多层次分析法”来构建国际体系理论。但与之前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强势地位相比较,现实主义出现了明显的式微之势。

与现实主义式微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出现了复兴的态势。其突出表现之一是,自由主义演进为诸多新自由主义流派。其中,又以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化程度最高,影响最大,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基欧汉(R. Koehane)、奈(J. Nye)、奥兰·杨(Oran Young)等。基欧汉和奈都是跨国主义者,强调跨国关系及国家之间体系相互影响的重要性。两人于1972年共同主编了跨国关系研究的开山之作《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7年又出版了跨国主义的主要代表作《权力与相互依赖》。1984年,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具有理性的人所创造和建立的制度对于人们在相互

^① 很多学者将该书的出版视为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划分的标志(如秦亚青2005年;白云真、李开盛,2009年),笔者也认同这一划分方式。

^② 参见K.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③ 参见秦亚青2005年,第218~221页。

^④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2004年,第276页。

^⑤ 参见白云真、李开盛,2009年,第407~408页。

依赖的社会中的决策和行为的重大影响,强调政治进程的可变性与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与合作,淡化冲突以及权力结构。该书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尔后延伸到全球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之中。^①

以多伊尔(M. W. Doyle)为代表的民主和平论也是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的一支重要的理论流派。民主和平论从国家政体类型层面阐释国家行为,侧重于对民主如何促进国家之间的和平等问题的研究。多伊尔主要关注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和原则是如何影响自由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的,认为自由权利和利益的政治联系奠定了自由主义国家之间互不侵犯的坚实基础;新现实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只能解释特定历史时期国际稳定的某些层面,对于自由主义的和平世界的诠释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民主和平论为处理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确实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两条线索值得关注。一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基本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克努成认真研究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三种基本研究范式后得出结论:“这一分类法把大量的国际关系学著作置于国际关系实践的三种传统的社会背景之中:国家间的体系、传统的互动系统和道德一致性。它抓住了影响当代政治学思想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左翼激进主义。”^②二是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掀起了国际关系学的第四次论战。它们之间的争论主导着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研究视阈和主要议程。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和后果、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国家的收益分配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层面。新现实主义侧重于对国家权力、安全、生存等问题的研究,强调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国际合作依赖于国家权力,以及相对收益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侧重于对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

问题的研究,在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同时还关注相互依赖的问题和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及绝对收益的重要性。经过争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经历了一个自我约束、再重新定义的过程,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融合,彰显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理性主义认识论。^③

四、1991年至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整合与建构主义的勃兴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关系出现了新的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许多新视阈,进而促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许多理论流派均呈现出新的理论形式。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并产生了理论上的整合,它们“都探讨无政府问题,而且它们都以同样的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方式来从事这一探讨”。^④与此同时,建构主义开始勃兴,并取得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平等对话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20世纪80~90年代在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理论流派,它主张用社会学的眼光审视国际政治,认为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是通过社会建构而形成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和利益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1989年,奥努弗(N. G. Onuf)在《我们造就的世界:论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中第一次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学领域。1992年,温特(A. Wendt)发表了《无政府状

① 参见白云真、李开盛,2009年,第86页。

②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2004年,第257页,第260页。

③ 参见白云真、李开盛,2009年,第409~410页。

④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2004年,第283页。

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构建》一文,引起了巨大轰动。该文被认为是建构主义勃兴的标志性宣言。温特在文章中质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致认可并作为研究起点的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克拉托赫维尔(F. Kratochwil)、瑞斯(T. Risse)、泽富斯(M. Zehfuss)等欧洲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使得建构主义在短时间内便一跃而成为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

在建构主义的挑战下,面对冷战结束、欧盟成型等国际政治现实,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也在修正和调整自己的理论观点,以便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新现实主义逐步演进为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三种理论流派。进攻性现实主义以米尔斯海默(J. Mearsheimer)、莱恩(Christopher Layne)等人为代表,主张在国际体系层次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获取安全的最佳手段是权力的最大化,所以在国际政治中几乎不存在维持现状的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埃弗拉(S. Van Evera)、沃尔特(S. Walt)等人,认为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结合,主要代表人物有施韦勒(R. Schweller)、布朗(M. E. Brown)和扎卡利亚(F. Zakaria)等。他们把国际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的不同变量结合起来,分析国家行为体的外交政策,认为“外交政策并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制定的,而是政府制定的;因此至关重要是政府力量而不是国家力量”。^①

新自由主义则在基欧汉的国际制度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奥兰·杨的国际机制论和罗西瑙(J. Rosenau)的全球治理理论。奥兰·杨制定了一个关于国际机制的理论框

架,从机制的任务、机制的有效性、机制的变迁和机制的关联4个方面,探讨国际机制影响国际社会互动的个体和集体行为的方式,进而揭示作为治理体系的国际机制的本质特点。罗西瑙则抛弃现实主义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分析方法,致力于分析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国际制度、非政府组织、个人等不同主体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索一体化和分化这两个矛盾的过程同时展现的国际大背景下,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的建构方式和途径。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研究是国际机制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全球政治进行多层次治理的理解,也有助于对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全球公民社会的认识。^②

此外,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后实证主义如建构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历史社会学、规范理论、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非主流理论流派,到90年代以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它们与以新旧现实主义和新旧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实证主义展开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第五次大论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哲学基础与元理论(meta-theory)两个层面。在哲学基础层面上,实证主义坚持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上的一元论、本体论上的客观实在论和价值论上的价值中立论,而后实证主义则主张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方法论上的多元化、本体论上的社会建构论和价值论上的批判性。在元理论层面上,争论主要集中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差异性问题,尤其是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性质与目的问题。在研究对象与范围上,后实证主义比实证主义更关注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在理论的客观性问题上,实证主义坚持客观主义,后实证主义则坚称意义与理解是建构出来的。在理论的评价标准上,实证主义坚持理论的真理标准,后实证主义则否认真

①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② 参见白云真、李开盛,2009年,第93页。

理的存在。无论如何,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标志着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哲学转向,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从方法论到知识论的转变,同时也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与范围。

从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演进具有以下特质。首先,研究范式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第一阶段以自由主义的研究范式为主,第二阶段以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为主,第三阶段又以自由主义研究范式为主,第四阶段则进入了以建构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三种基本研究范式并立为主的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多种理论与方法同时并存,有时是同一种研究范式中多种方法并存。其次,研究的主旨从权力政治向人类的终极关怀——人演进。现实主义恪守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的权力政治,权力政治是一切国际关系的核心。自由主义则强调个体自由的保障有助于和平的实现,试图限制国家的权力政治。国际关系学的前四次大论战,实质上就是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展开的,也即是围绕国家的权力政治展开的。第五次大论战,以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质疑以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取得了与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平等对话的地位,表现出强烈的国际政治权利平等的要求。由此可见,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主旨越来越多地关注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向权力—权利—人的方向演进。

参考文献:

1. 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秦亚青:《现代国际关系的沿革》,《国际前沿问题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
3. (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4.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 (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 (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7. (英)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8. (英)爱德华·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9.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
10.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N. J.: Prentice hall, Inc., 1983.
11. Woodrow Wilson, *The Fourteen Points*, in Phil William, Donald Goldstein and Jay Shafritz (eds.), *Classical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9.
12. K.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13. Michael W. Doyle, *Ways for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97.
14. Martin Wight,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 (eds.),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and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15.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16.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 Michael C. Williams, *The Realist Tradition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责任编辑:高媛)